

“晉伐中山”與春秋鮮虞 相關歷史問題

楊 博

中山是春秋戰國時期活躍在歷史舞臺上的由非華夏族建立起來的唯一“千乘之國”，特別是戰國時期，曾與魏、韓、趙、燕“五國相王”。中山國勢起而復興，興而旋滅，最終亡於趙國之手，其盛衰興亡反映了戰國七雄間的實力變化與相互關係，故清人郭嵩燾云：“戰國所以盛衰，中山若隱爲之樞轄。”〔1〕

但是傳世文獻中有關中山歷史的記載却十分有限，自西漢劉向編訂《戰國策》單列有《中山策》之後，西晉張曜《中山記》是最早的一部記述中山國史的專著，直至清王先謙《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才使後世有志於中山國史研究的學者得以考覽上下兩千餘年各家之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河北平山等地發現了大量的中山國文物和遺迹，使久已湮沒不聞的中山歷史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可是文獻記載與新的發現亦多集中於戰國時期，學者取得的成就也多集中於這一時期，〔2〕有關春秋時期中山史事的研究仍然處在混沌之中。由於春秋中山、鮮虞之間關係爭議不斷，戰國中山國的興起、發展、世系等基本問題也必然存在疑問。〔3〕

在這種情形下，任何史迹的吉光片羽均有可能啓發研究者構建通往未知之路。

〔1〕 [清] 郭嵩燾：《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序》，[清] 王先謙撰，呂蘇生補釋：《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補釋》第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 段連勤：《北狄族與中山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何豔傑等著：《鮮虞中山國史》，科學出版社2011年。

〔3〕 如戰國中山族屬問題，黃盛璋先生據1977年河北平山縣三汲鄉七汲村中山王譽墓出土的中山侯鉞銘（《集成》11758）提出“中山是周天子所建之邦，已明見於鉞銘，無法別作他解”，但是部分學者仍認爲戰國中山爲春秋鮮虞之繼續，如顧頡剛先生就闡述了鮮虞和中山國的承襲關係，並對鮮虞姬姓說提出了質疑。參看黃盛璋：《河北平山縣戰國中山國墓葬與遺物的歷史和地理問題》，《史學月刊》1980年第2期；顧頡剛：《戰國中山國史劄記》，《學術研究》1981年第4期。

值得慶幸的是,清華簡《繫年》中就發現了有關春秋中山史事的蛛絲馬迹,引起了學者的重視,^{〔1〕}筆者亦想在此基礎上對春秋中山的有關問題略陳己見,以就正於師友同好。

一、鮮虞與中山的關係

以《左傳》為代表的春秋經傳中多處出現“鮮虞”,而“中山”一名僅在《左傳》中出現兩次,為論述方便計,筆者總結如表一。由此引出了鮮虞與中山的關係問題,目前學界的主流觀點是贊同《左傳》定公四年杜預注所云“中山鮮虞”^{〔2〕}。此外《國語·鄭語》成周“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韋昭注:“鮮虞,姬姓在狄者也。”^{〔3〕}《史記·趙世家》曾云“(趙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索隱:“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為趙武靈王所滅,不言誰之子孫。徐廣云西周桓公之子,亦無所據,蓋未能得其實耳。”^{〔4〕}宋鮑彪據此言:“中山名始見定公四年。晉合諸侯召陵,謀為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是時勢已漸強,能為晉之輕重矣。《史·趙世家》是年書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國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與中夏抗衡?”^{〔5〕}李學勤、李零二位先生亦曾以中山王方壺銘(《集成》09735)“文、武、桓、成”的世系驗證了戰國中山確為春秋鮮虞之承繼。^{〔6〕}

表一 《春秋》、《左傳》記載的鮮虞與中山

年 代	《春秋》	《左傳》
昭公十二年	冬十月,……晉伐鮮虞。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皋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昭公十三年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沖競,大獲而歸。

〔1〕程薇:《清華簡〈繫年〉與晉伐中山》,《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2〕[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4633頁,中華書局2009年。

〔3〕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第461頁,中華書局2002年。

〔4〕[漢]司馬遷撰:《史記》第1797頁,中華書局1959年。

〔5〕[漢]劉向集錄:《戰國策》第116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6〕李學勤、李零著:《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題》,《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

續 表

年 代	《春秋》	《左傳》
昭公十五年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昭公二十一年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昭公二十二年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
定公三年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定公四年	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乃辭蔡侯。
定公五年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哀公元年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哀公三年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哀公四年		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哀公六年	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然而也有部分學者認為中山和鮮虞是兩個不同的國家，與鮮虞反抗晉國不同，中山是晉國的屬國。^{〔1〕} 清華簡《繫年》給這一爭議的解決提供了新的材料。簡文第十八章記述晉、楚爭霸過程中的兩次弭兵之會，其中描述第二次弭兵之會後的晉國情況有：（晉）遂盟諸侯于召陵，伐中山。晉師大疫，且饑，食人。^{〔2〕} 與《繫年》記載相應，由表一《左傳》定公三年與五年的記載晉人與鮮虞的戰事可以看出，晉人在召陵之盟

〔1〕 路洪昌：《戰國中山國若干歷史問題考辨》，《河北學刊》1987年第6期；天平、王晉著：《論春秋中山與晉國的關係》，《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4期。

〔2〕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180頁，中西書局2011年。

上藉以托詞的“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之“中山”確是指“鮮虞”而言，上引《左傳》定公四年杜注“中山鮮虞”的看法是正確的。

學者以往解讀自《左傳》定公四年始“鮮虞”與“中山”之名重複出現的現象，認為定公四年為鮮虞名“中山”之始，〔1〕然既已名中山，為何《左傳》下文仍二者複現？這也是認為“鮮虞”與“中山”不一的學者的主要疑問。筆者以為或可從《左傳》編纂材料來源中尋找答案。

筆者以為《左傳》的材料來源就其要者，可以歸納為三類。其一是取自當時社會盛行的“詩”、“書”、“故志”等文獻，“禮”、“易”等規則，由諸國貴族子弟之教材而轉為共同文化背景，在諸政治場合發揮作用。其二是取自春秋時期各國史官的記錄，這是當時的史官實錄。史官實錄也可分為兩種，其一是正式國史，其二是史官的個人記事筆記。其中經無傳有的材料多屬於史官筆記，而史官筆記亦分三種。其中一種是事件發生時，史官由於條件限制無法當時記錄，只好事後追記，或本國史官記別國之事，這類材料的特點是具體時間模糊不清，或有年無月，有月無日，甚至年月日皆無。其三是取自流行於戰國前期的、關於春秋史事的各種傳聞傳說，即所謂“語”或“事語”，“一般來講，《左傳》裏凡是長篇大論的對話，多屬於取自戰國傳說”。〔2〕

同理，記載周成王、周公封衛：“乃先建衛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餘民。”現藏大英博物院的康侯簋銘（《集成》04059）“令康侯鬲（鄙）于衛”可與簡文對讀，可知衛“康叔”之得名由來，確是因其曾先封於康丘之故，而且還說明之所以封於康丘，是為了“侯殷之餘民”，而後才有“鬲（鄙）于衛”事。而簡文則徑以“衛叔”稱呼剛剛封於康的“康叔”，可知“衛叔”這一稱呼出自後人追記。

綜上所述，上表列《左傳》“中山”之名，其定公四年記晉荀寅求貨於蔡侯不得，言於范獻子所謂“中山不服”一段或亦取自戰國傳說的部份，而哀公三年“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正合有年而月日皆無的情況，亦出自史官事後追記。雖然這部分材料的敘述主體應該是可靠的，但是其稱“鮮虞”為“中山”則未必是春秋當時人的稱呼。這在“中山”的稱呼僅僅出現在《左傳》兩處，而“鮮虞”之稱則復現於昭公十二年以後的春秋經傳中亦可見一斑。

如此，可知春秋時諸夏當以“鮮虞”來稱呼這一族屬，至鮮虞建國號名“中山”後方有“中山”之稱，按中山王方壺銘“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的世系，《史記·趙世家》云“中山武公初立”為建“中山”國號年是較穩妥的說法，上文引述鮑彪所言也是此

〔1〕段連勤：《鮮虞及鮮虞中山國早期歷史初探》，《人文雜誌》1981年第2期。

〔2〕王和：《〈左傳〉材料來源考》，《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種看法,是年當公元前 414 年,距魯哀公三年(前 492)約有 80 年之遙。

二、春秋鮮虞的族屬

在確定春秋戰國鮮虞、中山關係的基礎上,即可對戰國以前的鮮虞中山的相關史迹再作簡單爬梳,首先需要討論的是鮮虞的族屬問題。《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杜預注:“鮮虞,白狄別種。”〔1〕《穀梁傳》同年“晉伐鮮虞”,范甯《集解》引《世本》“鮮虞,姬姓,白狄也”〔2〕。上舉《國語·鄭語》韋昭注也說“鮮虞,姬姓在狄者也”。《世本》當戰國末期纂輯於趙人之手,〔3〕而鮮虞、中山春秋時與晉關係緊密,戰國時亡於趙,故“鮮虞白狄”說應該是有根據的。鮮虞屬狄在文獻中也有反映,如《左傳》定公十四年記晉六卿之亂,范、中行氏黨“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4〕,這裏的狄師,從後文記載鮮虞一貫支援范、中行氏的立場來看,無疑是指鮮虞之師。《國語·晉語九》載晉“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5〕。而《左傳》昭公十五年記同一事時却云:“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可知《國語》將《左傳》之“鮮虞”直稱爲“狄”,說明鮮虞即是狄。

《史記·匈奴列傳》云:“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西圍、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徐廣曰:“圍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索隱引《漢書·地理志》云圍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圍當爲‘圃’。”《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圃”字也。正義引《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6〕據史念海先生考察,圃水由今准格爾旗發源,流經陝西北部。〔7〕是知春秋前期白狄的活動地域當在今內蒙古東南部鄂爾多斯高原、陝西東北部及山西西北部。沈長雲先生曾考證周人與白狄同族,周人在古公亶父遷岐之前一直居住在“戎狄之間”。〔8〕

〔1〕《左傳·昭公十四年》第 4476 頁。

〔2〕《穀梁傳·昭公十二年》第 5290—5291 頁。

〔3〕陳夢家:《〈世本〉考略》,收入《西周年代考·六國紀年》第 135—141 頁,中華書局 2005 年。

〔4〕《左傳·定公十四年》第 4672 頁。

〔5〕《國語·晉語九》第 444 頁。

〔6〕《史記·匈奴列傳》第 2883 頁。

〔7〕史念海:《鄂爾多斯高原東部戰國時期秦長城遺迹探索記》,《考古與文物》1980 年第 1 期。

〔8〕沈長雲:《周人北來說》,收入《上古史探研》第 110—116 頁,中華書局 2002 年。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於箕。郤缺獲白狄子”，楊伯峻先生注“箕”在今山西省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並引江永《春秋地理考實》謂“白狄在西河，渡河而伐晉，箕地當近河”，因考證其地在山西省蒲縣東北。^{〔1〕}《左傳》襄公四年記魏絳說晉悼公“和戎”事，至《左傳》襄公十八年云“白狄始來”，杜預注云：“白狄，狄之別種，未嘗與魯接，故曰始。”^{〔2〕}《公羊傳》同年亦云：“白狄來，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3〕}說明此時白狄確實在晉國“和戎”政策下已經東遷至太行山東麓地區。此後史書頻繁出現“白狄”之名，至《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白狄朝于晉”後則不復現。到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後始有鮮虞之名出現。

具體的白狄東遷路線於史籍無載，學者則通過分析從鮮虞故地發現的只見於白狄活動區域的石槨墓、積石墓等石構墓葬特點，殉馬、牛、羊等殉牲習俗，銅鍔、提梁或扁形銅壺、細孔流鼎、青銅短劍、環首刀等北方式青銅器形制，虎紋、鹿紋、蟠蛇糾結紋、神獸紋、絡繩紋、狩獵紋及山字形紋等北方式青銅器紋飾，以及黃金飾品、尖首刀幣、瑪瑙石綠松石等玉石器、“披髮左衽”式的服飾、圓形帳篷等大量相關考古資料，來具體說明兩者在文化上的相似與承繼性。^{〔4〕}我們知道，族群遷徙也會存在部分遷徙的情況，而據表一可知，當時與晉人衝突的主要有肥、鼓及鮮虞等白狄支系，晉昭公十二年滅肥，十五年服鼓，只有鮮虞與晉戰爭不斷，故自昭公十二年始晉人面對的主要白狄就是鮮虞了。

三、鮮虞與晉的和戰

與白狄相比，赤狄在春秋初期十分強盛，《繫年》第四章簡文亦云“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崩虎起師伐衛，大敗衛師於畏，幽侯滅焉。翟遂居衛”^{〔5〕}，但到宣公十五年，晉人滅赤狄最大支系潞氏以後，十六年剿滅赤狄甲氏、留籲、鐸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籲、鐸辰”^{〔6〕}，最後在成公三年伐廆咎如，“討赤狄之餘”^{〔7〕}，到此時，

〔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493頁，中華書局2009年。

〔2〕《左傳·襄公十八年》第4264頁。

〔3〕《公羊傳·襄公十八年》第5012頁。

〔4〕何豔傑等：《鮮虞中山國史》第26—50頁。

〔5〕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貳)》第144頁，中西書局2011年。

〔6〕《左傳·宣公十六年》第4099頁。

〔7〕《左傳·成公三年》第4126頁。

赤狄基本為晉人所服。但是白狄、鮮虞到中山，雖然同樣一直與晉人摩擦不斷，却終春秋之世而得以存留，其與晉之間的力量對比與關係轉化值得探究。

在晉國對狄策略上，應該說前人對春秋時“尊王攘夷”、“華夷之爭”的主綫的總結是正確的，不論齊、晉，對戎狄均采取一以貫之的削弱策略。上舉晉人對赤狄采取剿滅式的征伐，對白狄亦是如此，上文僖公三十三年“八月戊子，晉侯敗狄於箕。郤缺獲白狄子”，即是其中之一例。

隨着晉秦、晉楚爭霸戰爭的持續，晉人需要穩固的周邊與後方基地，故晉悼公時采取了“和戎”政策，白狄因此獲得喘息之機，開始遷徙到晉國邊域的今山西省東北部到河北省中西部一帶的太行山東麓地區。《左傳》與《繫年》簡文均有反映的第一次“弭兵之會”的發生，代表着晉、楚大國間爭霸戰爭的暫時停歇，這樣晉人可以騰出手來解決更貼近自己腹地的肥、鼓、鮮虞等白狄支系，於是有表一所列定公四年以前的晉與鮮虞之間的歷次戰事，雙方互有勝敗，晉人得以滅肥、服鼓，但鼓時常叛晉。且定公三年（前 507）“鮮虞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對參加召陵之會的晉人來說，鮮虞相對於立有盟約的楚人，更是心頭之患。

召陵之會後晉人於當年及次年曾兩次由士鞅率師伐鮮虞。對於這兩次戰事的經過與結局，春秋經傳無載，《繫年》簡文則云“晉師大疫，且飢，食人”，學者或以為這一結局是指定公四年召陵之會結束後的那次征伐鮮虞的結局，因為簡文的前一句是晉人“盟諸侯於召陵，伐中山”，證明是召陵之會結束以後的行動，而且定公五年衛國的孔圉也帥師配合晉師圍攻中山，可以與簡文相互印證。此外，正是由於此年晉師中發生大疫，晉人無功而返的緣故，次年士鞅才又一次率師出征，圍攻鮮虞。^{〔1〕}

按荀寅所謂“水潦方降，疾瘧方起”應該可以與《繫年》“晉師大疫”聯繫起來，《左傳》襄公十年：“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2〕}此處亦是將“水潦方降”與擔憂大疫流行聯繫起來。瘧即瘧，《說文》云：“寒熱休作病。”段玉裁注：“謂寒與熱一休一作相代也。”^{〔3〕}《釋名·釋疾病》亦云：“瘧，酷虐也，凡疾或寒或熱耳；而此疾先寒後熱，兩疾似酷虐者也。”^{〔4〕}日人竹添光鴻箋“水潦方降”亦曰：“月令，仲春始雨水，週三月是夏正月也。”^{〔5〕}可知此處是指仲春時節，氣候乍暖還寒時所生之“瘧”，而《春秋》定公四年之“士鞅伐鮮虞”，其時約當秋

〔1〕程薇：《清華簡〈繫年〉與晉伐中山》。

〔2〕《左傳·襄公十年》第 4226 頁。

〔3〕[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第 350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4〕[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王先謙補：《釋名疏證補》第 278 頁，中華書局 2008 年。

〔5〕[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第 2148 頁，巴蜀書社 2008 年。

七月以後。相比之下定公五年“冬，士鞅圍鮮虞”，“圍”本身即不比“伐”可一戰而畢其役，需要耗日持久，則更合此處描述仲春時節所生之“瘡”。

再從定公十四年(前 496)及哀公元年(前 494)齊、衛聯合中山參與晉范氏與中行氏之亂來看，士鞅對鮮虞的征伐應該沒有取得什麼戰果，在這方面將《繫年》簡文理解為召陵之會後晉人對鮮虞征伐戰事的總結果亦未嘗不可。《左傳》昭公三年晏嬰、叔向論季世曾云晉公室軍隊早已“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1〕，此後晉人征伐均以六卿家兵為主力。“晉師大疫，且飢，食人”這樣一個災難性的後果，對於士鞅來說，以范氏之力，絕不可能短短一年就迅速恢復，可以投入兵力再次征伐鮮虞。

值得注意的是，按表一所載晉范、中行氏覆滅前，征伐鮮虞的主帥均出自范與中行氏，即范氏的士鞅與中行氏的荀吳、荀寅。召陵會後的兩次征伐鮮虞戰事，按《繫年》記載，晉師大敗，在當時六卿擅權的情形下，就是范氏大敗。而鮮虞中山再次出現，則是與齊、衛等同救范氏。范氏、中行氏廣結外援之事，如《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范、中行數有德于齊，齊不可不救”〔2〕，《左傳》哀公三年云“劉氏、范氏世為昏姻，……故周與范氏”〔3〕，同理此處鮮虞中山是作為范氏、中行氏的外援出現的，這在哀公四年，趙鞅克邯鄲後，荀寅奔鮮虞事上亦可看出。這樣，似正是士鞅伐鮮虞的大敗迫使其與鮮虞結為與國，而這些戰事於范氏、中行氏實力的大大削弱，亦是二卿在隨後而來的“晉人且有范氏與中行氏之禍”〔4〕中敗亡的原因之一。

四、小 結

隨着戰國中山史料的不斷發現，學界對於戰國中山的瞭解不斷深入，但是春秋鮮虞的族屬、文化及與諸夏(主要是晉)的關係仍然值得討論。隨着出土文獻與考古發掘資料的增多，學界對於戰國史書編纂的不斷認識，使得春秋鮮虞的面貌也逐漸清晰。

通過文獻分析與從鮮虞故地發現的，只見於白狄活動區域的相關考古資料的排比，使白狄與鮮虞族群之間建立了穩固的聯繫，而清華簡《繫年》簡文與《左傳》編纂材

〔1〕《左傳·昭公三年》第 4411 頁。

〔2〕《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第 1881 頁。

〔3〕《左傳·哀公三年》第 4686 頁。

〔4〕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貳)》第 180 頁。

料來源的討論，使鮮虞與中山的稱呼也得以拉開時間上的距離。鮮虞中山的長期存續，亦使得我們探究其與晉國間的關係變化，仔細探討公元前 506—前 505 年那兩場“晉與鮮虞”戰事的前因後果。

總體而言，承襲白狄而來的春秋鮮虞族群不斷因應晉國國策的變化，雙方雖征伐不斷，但最終鮮虞得存，至戰國中山更一躍成爲“千乘之國”。由於材料視角與水準所限，有關春秋鮮虞的史迹仍有許多需要再次討論，筆者本文只是其中的一個嘗試，敬祈方家不吝指正。

（楊博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後）

